

王引之《太歲考》成書考實

馬濤*

高郵王念孫(字懷祖,號石臞,1744–1832)、王引之(字伯申,謚號文簡,1766–1834)橋梓,好學深思,「就古音以求古義」,¹校考群經古籍,撰成的《讀書雜誌》、《經義述聞》二書,嚴謹精覈,為士林推重。關於二著成書歷程與刊本層次,此前學者探蹟索隱,取得矚目成果。²就《經義述聞》而言,從嘉慶二年(1797)初刻至道光七年(1827)三刻,³經屢次增刪,留下數種稿本、刊本,其三刻定本除卻條目增補,與前刻最大不同在於刊入《春秋名字解詁》及《太歲考》。《太歲考》初為單刊專書,被收入三刻本《經義述聞》前

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「漢唐曆術改革視域下的經義詮釋研究」(22CZS012)階段性成果。

* 馬濤,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歷史系副教授

¹ 王念孫:〈自序〉,載氏著,鍾宇訊點校:《廣雅疏證》,影印清嘉慶年間王氏家刻本(北京:中華書局,1983年),頁2。

² 劉盼遂:〈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〉,《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》第4卷第1號(1930年1–2月),頁47–48;陳鴻森:〈阮元刊刻《古韻廿一部》相關故實辨正——兼論《經義述聞》作者疑案〉,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76本第3分(2005年9月),頁441、454;張錦少:《王念孫稿抄校本研究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22年),頁17–51;虞萬里:《高郵二王著作疑案考實》(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2020年),頁107–13;趙永磊:〈經義述聞解題〉,載劉玉才、陳紅彥主編:《國家圖書館藏未刊稿叢書·著作編·經義述聞》(南京:鳳凰出版社,2021年),頁15–32。

³ 據初刻卷首自敘,學界多將初刻不分卷本《經義述聞》的刊刻時間定在嘉慶二年,張琦結合王氏友朋往返書信所示信息,將不分卷本的刊刻時間定在嘉慶九年(1804)到嘉慶十年(1805)間。見張琦:〈解題〉,載王引之:《經義述聞二種》(桂林: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,2020年),第1冊,序頁20–25。

曾幾經增補、修訂。⁴檢王氏父子友朋書札，知王引之於嘉慶二十年(1815)在山東學政任上曾刻《太歲考》廿餘篇，後廣寄學友參正。筆者通過王引之與陳壽祺(字恭甫，1771-1834)往來書信，循其所示，從時人萬世美(字虞臣，生卒不詳)論著中輯得王氏於嘉慶十九年(1814)所撰《太陰考》數條。由此，結合存世早期刊本，比勘前後，從王氏《太陰考》至初刻本《太歲考》，復至定本《經義述聞·太歲考》，其「三易其稿」之脈絡瞭然可循。而今存的初刻本《太歲考》中，又有兩種版本值得注意，一為上海圖書館藏李銳批簽本，一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王引之批校本。⁵前者存學友初閱是《考》之意見，後者則存王氏於定本付梓前的最後校訂意見。校覈前後批簽內容，可一窺《太歲考》初刻本、定本之間，諸多觀點形成、更易的歷史過程。

《太歲考》的內容主要與秦漢時期的「星歲紀年法」有關，⁶此前宋人吳仁傑(宋淳熙年間〔1174-1189〕進士)便已對「太歲」的名義有所論辯，⁷王應麟(1223-1296)則關注到秦漢時期文獻記載中「太歲一歲星」對應不一的現象，⁸但二人皆未慮及與之相關的秦漢紀年問題。及至清人王元啓(1714-1786)考辨太初元年年名異說，方稍稍觸及，然復以「其他年歲甲子非諸帝

⁴ 《春秋名字解詁》在刊入《經義述聞》前亦經這一過程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王引之批校本《周秦名字解詁》(善本書號07303)遍布批簽校訂之跡，顧廷龍〈周秦名字解故跋〉云：「此本曾經文簡手自增損，副墨再三，加訂體例，實為寫定《春秋名字解詁》之底本。」見顧廷龍著，《顧廷龍全集》編輯委員會編：《顧廷龍全集·文集卷》(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15年)，上冊，頁41-42。

⁵ 這兩種版本的具體情況詳見第二節所述。

⁶ 本文取劉坦意見，用「星歲紀年法」命名秦漢間的太歲/歲星紀年法，劉坦對此釋曰：「星是歲星之簡稱，所以不以歲代表歲星者，避免與下文歲字相誤。歲是太歲之簡稱，……星歲紀年雖與所謂『歲星紀年』同一指歸，但與云『歲星紀年』在名謂上有所區別者，因星歲紀年之制作，本以星、歲相應為原則，……為根據實際，明確指定歲星與太歲在紀年上相應為用之關係，所以於其在紀年上之地位，相提並重，名為『星歲紀年』。」見劉坦：《中國古代之星歲紀年》(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57年)，頁1。

⁷ 吳仁傑：《兩漢刊誤補遺》，收入徐蜀選編：《二十四史訂補》(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96年)，第4冊，卷5，頁1038-39。

⁸ 王應麟著，翁元圻輯注，孫通海點校：《困學紀聞注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年)，第3冊，卷4，頁584-85。

本紀所載，則概闕於不知」為由，將秦漢間有關星歲紀年事項置之勿論。⁹清代學者中，首先深入此學的當屬錢大昕（字曉徵，號竹汀，1728–1804），其離析「太歲」、「太陰」二名，在考辨名義之外，更藉之疏通秦漢間紛繁迭出的年名稱謂，還原太初以前的年名序列。¹⁰錢說一出，便於乾嘉之際掀起一股研辨太初年名的風潮，孫星衍（字伯淵，一字淵如，1753–1818）、嚴可均（1762–1843）、姚文田（字秋農，1758–1827）、許宗彥（號周生，1768–1818）諸人繼踵而至，¹¹取得豐碩成果，極大地改變了星歲紀年的研究面貌。至嘉慶二十年，王引之撰《太歲考》，旁徵博引，又將這一問題擴充出去，論題延及古六曆紀年與整個秦漢紀年序列。而《太歲考》是如何在當時的學術環境中催生而出，《考》內諸條的學術淵源是否前有所自，便成一樁有待解決的問題。

有鑒於此，筆者結合王引之同年、友人學術交誼的實況，校覈《太歲考》歷次刊本及批簽內容，嘗試還原由《太陰考》至定本《太歲考》刊布的十餘年間，其學術觀點漸次演進的歷程，並寄望此項研究觸及嘉慶四年（1799）己未科諸同年之間學術交遊的實態。

⁹ 王元啓：〈太初改曆年名辨〉，載氏撰：《史記三書正譌》，收入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：《二十五史補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5年），第1冊，卷2，頁69。

¹⁰ 錢大昕說互見於多種著述中，其主要內容見錢大昕：《廿二史考異》，收入陳文和主編：《嘉定錢大昕全集（增訂本）》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第2冊，卷3，頁47–48；錢大昕：《十駕齋養新錄》，收入陳文和主編：《嘉定錢大昕全集（增訂本）》，第7冊，卷3〈太歲〉、卷17〈太陰〉，頁102、459–60；錢大昕：《潛研堂文集》，收入陳文和主編：《嘉定錢大昕全集（增訂本）》，第9冊，卷14〈答問十一〉，卷16〈太陰太歲辨〉，卷34〈答大興朱侍郎書〉、〈與孫淵如書〉，頁212–17、246–47、554–58。

¹¹ 孫星衍：〈太陰考〉，載氏撰，駢宇騫點校：《問字堂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），卷1，頁22；嚴可均：〈太初元年甲寅、丙子說〉，載氏著：《鐵橋漫稿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編纂委員會編：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第1488冊影印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四錄堂刻本，卷4，頁670–72；姚文田：〈史記曆書考〉，載氏著：《邃雅堂集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第1482冊影印道光元年（1821）江陰學史署刻本，卷3，頁420–25；許宗彥：〈太歲太陰說〉，載氏撰：《鑑止水齋集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第1492冊影印嘉慶二十四年（1819）德清許氏家刻本，卷13，頁430–34。